

# 为什么是诗性语言? 诗性语言之革命性再解读

李 莹 董明来

**摘要：**潜藏于无意识中的语言结构，构造着主体的在世经验与周围世界，主体凭借言说这种单向、线性的科学话语来确定人格自身。这一述谓结构与象征秩序是同构的，它构成了主体日常生活的全部。然而，巴赫金对词语之双值性的发现为打破述谓逻辑埋下了伏笔；沿着后结构主义脉络，克里斯蒂娃通过强调诗性语言的复义，以及蕴含多重可能性的互文空间，看到了主体越出权力生存的某种可能性。经由“过程中的主体”，诗性语言发起了一场席卷文本空间与社会政治领域的革命实践。

**关键词：**诗性语言，主体，述谓结构，革命实践

## Why Poetic Language? A Revolutionary Reinterpretation of Poetic Language

Li Ying Dong Minglai

**Abstract:**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n the unconscious constructs the subject's experience and the world around it. The subject also defines personality itself through linear and indexical discourse. This discursive structure is structurally identified with the symbolic order, which constitutes the totality of the subject's daily life. However, Bakhtin's discovery of the bivalence of words makes possible a break with the logic of predication. From the post-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 Kristeva identifi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subject's transgression of power by emphasising the polysemy of poetic language and the intertextual

space of multiple possibilities. Through the “subject in process”, poetic language initiates a revolutionary practice that sweeps through textual space as well as the socio-political sphere.

**Keywords:** poetic language, subject, predicate structur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DOI:** 10.13760/b.cnki.sam.202402008

1965年圣诞前夕，来自保加利亚的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只身一人来到巴黎求学。此时的法国思想界，正处于结构主义思潮的黄金时期：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阿尔都塞等大批结构主义学家们汇聚巴黎，盛况空前。受到俄国后形式主义学者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启示，克里斯蒂娃扎根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沃土，通过发展“被结构主义忽略的两个方向”，把自己“推到了后结构主义开拓者的位置”。这两个方向，分别是“对文本历史的开拓”亦即对互文关系或者说文际关系的考察，以及“对‘言说主体’的研究。包括主体性与言说行为的研究，而不仅关注作为阐述结构的话语”（2016b, p. 11）。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从主体理论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诗性语言”这一克里斯蒂娃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在其奠基性的论文《词语、对话和小说》中，克里斯蒂娃已经通过介绍巴赫金发展起了一种关于主体及其言说的理论。1974年，其博士论文《诗性语言的革命》的出版标志克里斯蒂娃的理论视野由文本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正是在此书中，她正式提出了“诗性语言”的理论。克里斯蒂娃提出此概念的目的，可以说是政治哲学的：在她看来，以现代诗歌作品为代表的诗性语言所标明的，正是主体越出权力生存的可能性。

## 一、诗性语言与过程中的主体

作为后结构主义的开拓者，克里斯蒂娃高举反本质主义大旗，借助互文性理论，将语言从单一、稳定的囹圄中解脱出来，重新为其赋予动荡与可能性。“过程中的主体”，作为一种区别于边缘主体，且能对象征秩序进行合法逾越的异质性主体，正是通过诗性语言来重新调动被遮蔽的、专属于主体的激烈性的。

### （一）从言说主体到过程中的主体

克里斯蒂娃对主体的思考，受惠于精神分析良多。不同于传统哲学将主

## □ 符号与传媒（29）

体看作稳定不变且完整统一的确定性存在，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脉络将言说活动视为主体确立其主体性的关键，形成了“言说主体”（*sujet parlant*）的概念。言说的主体寓居于一个外在于他的精神秩序之中，此秩序是他的主体性得以生成的前提。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这就是“象征秩序”，而且“一旦到了主体（儿童）象征地说出，表明主体已经进入了象征秩序，说话主体就发生了。说话主体的发生是一个主体性确立的过程”（黄作，2005，p. 184）。主体性不再是主体内部先验性的存在，而是由外部世界中的话语活动构建的，同样，“言说主体”也是唯一能够存在于经验世界之中的主体形式。

以“言说主体”为基础，克里斯蒂娃提出了“过程中的主体”（*sujet en procès*），并将其作为诗性语言所对应的特殊主体。她是这样表述二者关系的：“诗性语言通过标记和符号态易化的网状体系将主体置于过程之中。”（2016a, p. 42）这就是说，由于诗性语言能够在象征态中重现符号态的功能特征，亦即将隐藏于符号－句法之下涌动着的音乐和律动重新展现在言说活动中。进而，与其对应的“过程中的主体”就是那些在言说活动中既能遵循句法规范，又能尽情享受韵律的主体。详细来说，正如意义生成需要历经“符号态—命名时段—象征态”这一过程，主体的形成也离不开这三个阶段。其中，命名时段作为一个短暂的停滞状态，是主体及其对象确立的标志。“过程中的主体”之所以形成，正是由于（作为主体假定的原初时刻的）命名时段在符号态的子宫间的驱力运动中持续被冲击，以至于它总是处于变动的过程中。“对于主体而言，命名时段不是一种对符号态的子宫间的压抑，而是主体正在承受或者经历的位置，因而只有主体可以质疑命名时段，从而表述一种新的格局。”（p. 34）所以说，“过程中的主体”始终质疑着一个质疑命名时段所假定的主体，这个被质疑的东西，就是处于象征秩序之中的说话主体。这也是“过程中的主体”与“言说主体”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过程中的主体”虽发轫于“言说主体”，但并非如后者一般完全臣服于句法规范，而是在驱力洪流的帮助下质疑后者，试图在具体的言说活动中将无序、非理性、身体碎片、音乐、韵律等异质性元素展露出来。实际上，“过程中的主体”可以视为克里斯蒂娃借助诗性言说为主体开辟的一条存在之路，它站在言说主体的肩膀上发现了语言中本就存在的韵律。

### （二）过程中的主体：介于精神病与恋物癖之间的异质性主体

相较于兢兢业业遵循符号－句法规范的“言说主体”，“过程中的主体”

由于从话语中发掘出了“未经允许的快感”而被打上异质性的标签，其异质性更表现为它与“异常主体”<sup>①</sup>之间的距离——它并未像精神病人和恋物癖者一样完全被社会秩序驱逐在外。

在进入社会秩序之前，任何主体都必然要在母性的符号态空间中被孕育，他们沐浴在子宫间驱力的潮涌之中，直到接受命名时段的过滤，洗刷“前主体”身上不连续的物质能量。尽管“过程中的主体”与精神病人都未能完全拦截驱力洪流，致使享乐渗透于语言秩序之中，但命名时段却成为二者区分的关键：前者认可些许驱力透过命名时段的裂隙钻进象征态，使得命名时段的假定不充分，而后者则任由符号态驱力彻底摧毁命名的门槛。显然，正是由于精神病人将完全浸染无意识能量、尚未形成主体的躯体放入主体规范之中，所以其必然会招致来自象征秩序的驱逐。与之相反，“过程中的主体”则将部分享乐驱力悄悄带入秩序之内，并因此得以免受规范的否定。福柯通过疯人与疯癫状态在社会中截然不同的境遇，来展现精神病患者与“过程中的主体”的区别：如果说，疯人——从中世纪搭乘愚人船被放逐于水域，到17世纪被禁闭于陆地，直到19世纪被关进精神病院——一直处于隔离，那么疯癫状态却持续存在于文化，“话语涵盖了整个疯癫领域……”（1999, p. 90）正如当前互联网上的“发疯文学”，就呈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但他们并非病理学意义上的疯人。因此，“过程中的主体”正是将隐藏于话语之下的音乐、律动、激情、谵妄等通过话语表达出来，却没有如精神病人或疯人的语言一样彻底背离语法规范，进而并不会被驱逐，也不会被隔离。

另一种与过程中的主体的经验模式类似，但又与之有区别的生命样态，乃是恋物癖或者说“物的偶像崇拜”。克里斯蒂娃（2016a, p. 47）指出：“诗性功能与恋物癖汇集于一点，但是并不能等同于恋物癖。它们运作机制的区别在于，诗性功能包含着意义。”一方面，由于物的堆积阻滞了阳具的通达，物恋者的性实践并未导向生殖规范，反而是借由物神获得了一种大他者的享乐——“它是非性化的在语言之外的享乐。证据就是对这种享乐的沉默……这种享乐不能被说出来，它不属于能指的秩序。”（瓦尼埃，2019, p. 107）另一方面，物恋者又的确认可并执行了性行为。这意味着，尽管恋

<sup>①</sup> “言说主体”作为唯一能够存在于经验世界之中的主体形式，意味着主体能够通过言说符合语法-句法规范的话语来确证自我的存在，这些话语是可以被他人理解并用于交际的，我们常称这类主体为“正常人”。而所谓“异常主体”，就是那些无法与他人进行交流，以及其行为违背社会规范的主体，他们游离于社会主流，被称为“边缘人”。

## □ 符号与传媒（29）

物癖被以生殖为中心的性活动驱逐至秩序边缘，但是性规范却并未彻底排斥它，它仍旧在无序与秩序的边界处游荡，而这恰与“过程中的主体”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不同于“过程中的主体”直接跨越了命名时段，恋物癖向命名时段妥协了。为了能够进入象征秩序，恋物癖将命名时段中需要假定的指称性命题替换为其自身的停滞状态，亦即停滞状态本身作为一种被假定的命题进入象征秩序，进而即便恋物癖无法完成生殖目的，也仍然作为一种被排斥的反常主体存在于规范之中。

如果说，精神病和恋物癖患者都因为对象征秩序或多或少的破坏而被迫游荡在秩序边缘，那么“过程中的主体”在逾越规范的同时则未曾遭遇驱逐。他在言说活动中遵循符号-句法规规范，说着能够被他人理解的语句，却通过挖掘话语最原初的音乐和韵律，从而享受着稍纵即逝的快感。

## 二、为什么是诗性语言：语言结构与主体形态

然而，为什么克里斯蒂娃关于过程中主体的思想，会导向“诗性语言”概念呢？或者说，为什么偏偏是诗性语言塑造了具有激烈革命性的主体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依照克里斯蒂娃的路径，重新回到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脉络当中去，探寻语言结构与主体形态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任务，最方便也最直接的思想线索，当然来自雅各·拉康。在《诗性语言的革命》中，拉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本文下面的探索，就从拉康开始。

### （一）语言结构：优先于主体并构造在世经验

作为现象学、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汇合点，拉康明确意识到人格的文化和历史内容的本质，乃是语言结构：“精神分析经验在无意识中发现的，乃是语言结构……伴随着它的结构，在主体与主体之精神发展的某个阶段进入它之前就存在着。”（Lacan, 2002, p. 413）语言结构是过去的言语活动在主体中沉淀的结果，在使用此结构中的要素时主体并不会主动地意识到它，亦即，在言说或者倾时时“我”不但不会主动回忆“我”习得语言的过程，而且实际上也不会把抽象、同一的“词”本身作为“我”的意识对象——“我”的意识对象是“我”说出或者听到的言语组合。换言之，语言结构实际上是在无意识中被调用的主体能力，它先于主体存在。

然而，语言结构不只是主体言说的能力，更对主体的整个在世经验都有着构造的作用。世界的外部性质翻转了具身身体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世界

以身体为中心，而是身体依赖于外部世界。但自我就意味着同一，外部的绝对只意味着自我无法把对象当作具身身体的一环，而不意味着自我不再欲求与对象的同一。在拉康看来，我的身体所依赖的对象既然是绝对的他者，那么与它的同一就也只能采取翻转的方式，亦即让我成为这个我无法改变之物的一部分——进入它。用拉康自己的话来说，“唯有通过穿越言语之极端的窄道，他能够完成这一进入”（p. 40）。所谓“穿越言语的窄道”，亦即进行言说。言说是主体获取语言的过程，而获取语言虽然看起来是让语言在我之内，实际上是反过来，让主体在语言之内。如果聚焦于语言，就意味着主体需要“习得语言”。唯有当语言结构中的具体要素——词义、语法、修辞规则，对主体显示为先在、确定，有着无可辩驳且不能被怀疑的自然存在时，主体才通过不断地经验它们而习得它们，让它们沉淀为自身的能力。正如婴儿在成长过程中言说自己的欲望，不但是向养育者指出自己的欲望，而且是持续地向他指出世界的运作：如果他说话，如果他礼貌地说话，如果他听话，那么世界就是可理解的。

当然，言语对世界的构造作用并不只发生在婴儿身上：它是在世存在的持续结构。正如我之所以总是把鞋子经验成鞋子，是因为我总是在说着关于鞋子的话语。鞋子包括在我的世界之内，而我的世界更是由我的言说构造的：我回到家脱下鞋子时会把鞋子乱丢，无所谓鞋尖究竟是朝向屋内还是屋外；我之所以能够以这种无所谓的态度经验我的鞋子，是因为我不认为如果鞋尖是朝着屋内的，我就会邀请一些妖魔鬼怪进门——而我之所以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妖魔鬼怪的世界中，当然是因为我并不言说这样的故事。但对于言说着它们的人来说，进门时所脱下的鞋子就是必须仔细摆放的东西了。在这里，无论我言说还是不言说关于鬼怪的语言，这种言说的选择都是我的世界的前提：它要么被塑造成一个被祛魅的现代世界，要么仍然是一个氤氲着玛娜（Maná）的天地。

总之，语言结构是言语行为沉淀的结果，而经验沉淀所塑造的又是言说主体的内容，所以说，语言结构就是言说主体的内容，而让主体得以成形的一切意向经验都发生在言语－指示的世界之中。

## （二）象征秩序：从“0”到“1”的述谓结构

语言结构作为一种无可辩驳的东西，召唤着主体向它靠拢，亦即“习得语言”，同时它也构造着主体的言语－操劳经验与其存身的周围世界，而分析哲学意义上的述谓语法与言语－操劳经验是同构的。作为精神分析符号学

## □ 符号与传媒（29）

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克里斯蒂娃已然意识到述谓结构与某种主体形态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在克里斯蒂娃（2016b, p. 24）看来，“与‘符号生成’相对的是‘象征生成’。后者包括判断与命题，属于意义领域，也就是立场领域。‘立场性’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是一个分界点，它的标志是主体的确立，以及随之产生的对象的确立，而‘符号生成’不属于这样的意义领域”。象征秩序中包括判断与命题，亦即包括述谓逻辑<sup>①</sup>。对某物的实存有立场同时是对它有所喜好，有所厌恶，乃至有所操作。在克里斯蒂娃（2016b, pp. 157 – 159）这里，述谓命题是基于“0—1”序列的逻辑系统，显然，这里的“0”是指言语，而“1”应当被理解为在一个确定的世界中有确定位置和功用的事物。进一步，述谓命题的作用是指向一个有着清晰的因果关系的世界序列，唯有在这个世界中，言语组合段才能作为“0”而把主体引导向世界中清晰的位置上。作为一种科学语言，述谓命题之逻辑清晰性出于这样一个要求：主体所有的言说都必须指向一个确定的世界。确定的世界属于一个确定的主体，或者说确定的世界是一个确定的人格自我的周围世界。“（语言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禁律’是1（上帝、法律、规定）……”（p. 159）此处“禁律”的概念极为关键：禁律必然通过言语表达，同时它实际上呈现为语言秩序；禁律说明了什么是被禁止的，亦即什么是有害的。禁律由大他者提出，遵循禁律就是向这个大他者趋近。或者用拉康的话来说，倾听由大他者给出的禁律，就是穿越言语的窄道。遵从禁律就是让语言－象征结构在主体内部沉淀为无意识，亦即在主体的经验中起着引导构造的作用。例如男性/女性公共空间的区分，尽管这些空间鲜少用文字标明男性/女性，更常见的是张贴烟斗或裤装小人以及高跟鞋或裙装的标识，而之所以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分清并进入自己对应的空间，是因为沉淀于我们无意识中的是这样一种经验：烟斗或裤装代表男性，高跟鞋和裙装则代表女性。实际上，在这种经验之上的是“我是男性/女性”的话语，正是这样的言说构造了我们的经验，使我们进入专属空间。相反，一旦无法在二元性别中言说（如跨性别或泛性别人士），就不能进入对应空间，以致只能被动地消失在公共空间。因此，述谓结构不仅表现为一种单向、线性的意指关系，还可以看作对外部世界的秩序规范的再现，只有掌握并遵循它，才能够在社会中正常生活。

---

① 述谓逻辑是一种建立在希腊（印欧）句式基础上的现代逻辑方法，这种句式以“主语 + 谓语”为架构，以一致性、判断和因果关系为推导手段。

通过禁律现象，我们还可以抵达下一个关于主体与象征秩序的重要洞见：“只有通过对现有界限违反，才能感知规范的存在。界限之外的‘不正常’反而是规范建立的基础。”（戴雪红，吴家丞，2022，p. 26）象征秩序以禁律的形式为主体指明未来，并要求主体持续地投身其中。在拉康著名的“L图式”中，大他者处于右下角，拉康认为生成的主体“应该”处于那里——显然，这就是说他永远不可能抵达那里。联结S和A的对角线被镜子折断，所以这条对角线的左上段（联结着镜面和主体S）是虚线，且在简版图式中则直接不存在（Lacan, 2002, p. 40, p. 458）。这意味着，主体总是无法与大他者同一，或者说大他者对他的要求是永远无法真正完成的。这道理也非常简单：主体的生活总是面向未来，而无论是对主动行为的命令（做这个！）还是禁律（不要做这个！）几乎可以说从语法上就总是未来式的。大他者和主体之间的直接关联被镜子折断，但是镜像或者说想象界，亦即主体和自身的关系，却曲折地勾连了二者：大他者呈现为禁律－言说，呈现为指向未来的言说。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洞见是对的：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呼唤人。语言从“存在的大道”而来，它所指示的未来需要主体持续地加以充实。

在这里进一步推演或许不如举例子有效。在加缪的《鼠疫》中，据主角之一塔鲁的观察，预审推事奥东先生一家，父亲是“驯服的猫头鹰”，母亲“小得活像只黑鼠”，而两个孩子则“打扮得像两只训练有素的小狗”。父亲总是用敬语说最恶毒的话，其中包括谈论当时已经在城里到处出没的老鼠，而他的妻子则说“您爸爸说得对”。（1999, pp. 255 – 256）父亲的一切行为都遵循中产阶级的礼仪要求，而提起老鼠是不体面的。父亲时刻地在对孩子说着刻薄恶毒的话语，因为孩子只要还是孩子就永远无法让父亲满意（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判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父亲的话语正是孩子通往他们体面的“食盆”的通道。这就是禁律发生的方式。父亲的禁止之所以自信而不容置疑，是因为它指示了一个自然在场的中产阶级秩序，在其中一切都“理当如此”，即使人永远无法追上这理当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父亲与秩序是二位一体的。

象征秩序借助线性、单向的述谓命题渗透进主体无意识的言语经验，并成为其构成周围世界的依据。它通过禁律规范主体的行为，主体也同样通过遵守禁律来取得继续存身于社会的许可证。它为主体划定了一个貌似确定的存在价值，要求主体持之以恒地达到它，但由于主体操劳的未来面向与父系禁律的过去言说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主体只能在证明自身价值的路上疲于

奔命。

### （三）诗性语言：逾越禁律的话语实践

无限趋近却永远也无法到达大他者所指示的未来就是主体的归宿吗？或者说，主体只能言说着线性单向的述谓话语，朝着永远也无法抵达的彼岸前行吗？文章开篇所提到的“过程中的主体”就是克里斯蒂娃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通过强调诗性语言中词语的双值性，克里斯蒂娃看到了主体存在的新的可能性。诗性语言的复义，让它不可能有清晰的意指，亦即无法落回到判断和命题的领域，进而“基于0—1序列的逻辑系统对解释诗性语言的运作是无能为力的”（2016b, p. 158）。可以说，诗性语言不再是从“0”到“1”的述谓结构，相反，它作为一种从“0”到“2”的“连续体的能量”（puissance du continu）逾越了“1”，成为唯一能够摆脱禁律的语言实践。

事实上，诗性语言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体僭越象征规范的话语实践，还需要回到克里斯蒂娃理论的开端，亦即“互文性”概念。诗歌语言中词语的双值性构筑了一个多重意义上能够容纳无限可能性的开放式空间。一方面，作为语言的最小单位，词语成为容纳无限义素的空间。巴赫金所提出的“双值性”概念让言语链条的“横轴”与文本关系之间的“纵轴”同时发挥作用。这意味着，言语中所有具体的词的意义不但是由现有言语链条中其他的部分规定的，而且同时是“引言的嵌套组合”——或者说，“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克里斯蒂娃，2016b, p. 150）。在这里，文本的横轴当然是雅各布森、拉康和巴尔特所说的转喻展开，但是引言的纵向结合却并不完全等同于隐喻－象征秩序：互文关系中被“引用”的其他文本意义不像在隐喻秩序中那样被现有文本的词替换，而是同时地在当下的文本中发挥着作用。克里斯蒂娃自己的一个例子很有启发性。她提及马拉美的一句诗：“Hyperbole！Dema mémoire. Triomphalement ne sais-tu. Te lever, aujourd’hui grimoire. Dans un livre de fer vêtu...”克里斯蒂娃（2016b, p. 25）提出，这两行诗的关键并不是它们说了什么，而是在“hyperbole”（双曲线）一词中人们能听到“père”（父亲），而在“ma mémoire”（我的记忆）中又有“maman”（母亲）。“父亲”的意义与“双曲线”纠缠不分，而记忆在熟稔于法语的耳朵中则同时有母性的感觉。所谓的互文性，首先就是指在“双曲线”一词中“父亲”义素的出场。如此一来，每个词实际上都是容纳近乎无限之义素可能性的容器。

另一方面，具体的诗歌文本也因为向社会历史开放，而成为一个多重文

本空间。这个空间能够提供让具体文本变得丰饶的可能义素，它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这个整体既包括语言结构本身，更包括整个特定文化传统中的所有可能文本。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空间都不可与身体要素分割。索绪尔本人就指出，聚合－联想关系不但可以通过义素的关联产生，也可以根据读音的关联而被呈示给主体：法语“enseignement”（教育）一词不但可以和“enseigner”（教学）等拥有同样词根的词，或者与“armement”（装备）等共享名词性词缀的词构成聚合关系，而且可以和“justement”（恰好）这样只是一部分读音相同的词一起被纳入同一个联想集合之中（2019, pp. 181 – 182）。“双曲线”和“父亲”在法语中的关联，显然也属此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双曲线”一词通过读者的唇舌而在读者的意识中投下父亲般沉默而巨大的阴影。

进一步来说，互文空间被克里斯蒂娃称为空间。这也不只是因为诗歌语言必然像马拉美《骰子一掷》那样，拥有特殊的视觉－印刷形式。马拉美的名作只是让互文的空间性品质更为显豁地体现出来而已。与其说“空间性”意味着阅读中视觉的统治地位，倒不如说它标明了义素关联的非线性。克里斯蒂娃本人也意识到，“《骰子一掷》的空间布局旨在把诗歌语言是某种体积、其中建立了种种出人意料的关系（言语闻所未闻的非逻辑性关系）的情景搬上页面……”（2015, p. 213）需要强调的是，语法组合的线性和单向性与述谓逻辑的线性和单向性是同构的，同时，在语言学中言语组合段又被认为有一单向的时间流逝。主体的时间经验当然并没有几何射线那样的整齐和单向性质，相反，在此意识之流中各种印象总是同时混杂，即使这些印象根据编年史式的时间概念应该被归在不同的客观时刻之中。柏格森认为编年史式的时间是“空间化了的”，不过这里他强调的是空间的均质和可计算。与之相反，克里斯蒂娃在“空间”中看到的是“出人意料的结合”：在读《骰子一掷》时，“很难甚至不可能在一个主、谓、宾结构的规则句子里排列上述诗段，而即使我们做到了，也将损害诗歌文本不可察觉意义的效果”（2015, p. 220）。这意味着，任意一个词都可以与铺展在纸上的印刷痕迹中的任何一个词相关联，即使二者在空间上相隔甚远而且之间没有任何符合规范的语法联系。被诗句的空间排列打破的逻辑－语法限制，同时也是“空间化的客观时间”限制。

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个开放式的互文空间，回到克里斯蒂娃对诗性语言的描述，我们或许能看得更加清楚：“诗歌呈现了语言秩序内部驱力易化的不停歇的抗争……诗歌，更准确地说，诗性语言，提醒我们它永恒的功能：即

## □ 符号与传媒（29）

通过象征态引入那些作用于诗性语言的内容，以及那些穿越它和威胁它的内容。”（2016a, p. 60）符号态的子宫间的驱力洪流永不停歇地冲击着命名时段的门槛，使其始终处于“破碎—重建”的过程，以至于设想中清晰的意指边界变得模糊暧昧，这不仅使意义处于持续生成的过程之中，冲击产生的裂缝也为驱力的入侵埋下了伏笔。前面所提到的开放式空间接纳的正是这些无序的能量。显然，诗性语言的结构为其赋予了一种无可比拟的特殊性，它在断裂处连续，却在连续状态中呈现断裂。搭载着永不停歇的驱力洪流，符号态中不连续的物质能量渗透进象征秩序中，为命题提供停顿、韵律，调动身体回应来自原初母亲的呼唤。每一次表述都潜藏着享乐的可能性，每一个句子都蕴含着比事实更多的内容。

既然诗歌中的每一个词都混杂着诸种可能的义素，具体的诗歌文本更能从历史维度和时空维度打破线性逻辑，那么诗性语言本质上就无法完成指向象征秩序所塑造之世界的任务，从而逾越禁律。亦即，诗性言说无法给予主体确定的在世经验，无法让主体找到经验世界中的一个确定位置，亦拒绝为主体构造一个确定的周围世界。如果说，言说线性的述谓话语，让主体踏上了一条被禁律规范着的单行道，朝着那个永不可即的未来前行，那么，在诗性话语中，则没有大他者的律法，没有父亲的阴影，没有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未来，在这里，一切都是混沌，都是可能性的延伸，主体可以随意穿梭于任何一条林中小路。

## 结语

现在，终于可以对“为什么诗性语言具有革命性？”作一个回答了：诗性语言的革命性尽数体现在其“过程中的主体”上，而它之所以能够为主体赋予如此强大的激烈性，正是因为它从结构上为词语、文本拓展出了一个开放空间，这个空间允许无限可能性的存在，通过言说这种含混、暧昧的话语，主体从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片刻的喘息。如果说，象征秩序通过清晰的意指关系将主体安排到各自的位置上，为其划定存在价值和禁律的范围，那么言说着诗性语言的主体，即“过程中的主体”，显然中断了这一秩序；处于后一种状态下的主体在言说中寻找快感，却未被秩序驱逐至边缘。涌动在每个音节之下的律动悄无声息地潜进身体，父亲的命令被暂时搁置，除了调动身体来回应原初母亲的呼唤之外，别无他法。

**引用文献：**

- 戴雪红, 吴家丞 (2022). “规范”的力量——对朱迪斯·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的一种探索.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 23–32 + 169.
- 福柯, 米歇尔 (1999). 疯癫与文明: 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刘北城,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黄作 (2005). 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加缪, 阿尔贝 (1999). 加缪文集 (郭宏安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克里斯蒂娃, 茱莉亚 (2015). 符号学: 符义分析探索集 (史忠义等,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克里斯蒂娃, 茱莉亚 (2016a). 诗歌语言的革命 (张颖等,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克里斯蒂娃, 茱莉亚 (2016b). 主体·互文·精神分析: 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 (祝克懿, 黄蓓, 编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索绪尔, 德·费尔迪南 (2019). 普通语言学教程 (高名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瓦尼埃, 阿兰 (2019). 拉康 (王润晨曦, 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 Lacan, J. (2002). *Écrit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作者简介：**

李莹,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符号学理论。

董明来,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现象学哲学、符号学理论、形式主义文论与宋明儒学。

**Authors:**

Li Ying,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Her area of specialization is theoretical semiotics.

Email: liying931@outlook.com

Dong Minglai,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His areas of specialization include phenomenology, semiotics, literary theory and Neo-Confucianism.

Email: dongminglai@outlook.com